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第六章

艾地的角色(中)

时，在三个地方（直葛、八马兰、北加浪岸）发生了从日本所培植的腐败和压迫人民的文官政府手里夺权的“三地事件”。

这三个地方的人民已经在日本占领时期受够了苦难。从日本所培植的文官手里接管地方政府领导权的运动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

但是，印尼共和国政府指责此行动是分离主义，不利于印尼共和国。因此，政府采用武力镇压。

参与此行动的印尼共领导人成了被告。阿米尔·沙利弗丁通过社会党的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工委委员苏本诺进行干预，导致三地事件的政治解决。卷入此事件的印尼共领导人萨尔吉托、陈仁锦等人被释放，此后还参与领导印尼共产党。

然而领导此运动的维达塔失踪了，后来才发现他被印尼共产党的领导判处了死刑，因



艾地与毛泽东会面

为他被认为是煽动印尼共产党反对印尼政府，犯了大错。为此，由于维达塔被党判处了死刑，党就不可以说，他是日本占领时期的党主席。这就是艾地不能回答毛泽东“谁日本占领时期领导印尼共产党”这个问题的缘由。

据了解，9·30事件前维达塔已经得到平反，用他的名字命名印尼共产党干部特殊教育学院，与阿里尔汉姆及巴赫塔鲁丁齐名。

毛泽东问的另一个艾地很难回答的问题，是1948年茉莉芬事件时艾地在做什么。

正如众所周知及前文所述，艾地与阿利敏一起被捕，但在抵达梭罗之前逃脱，而其他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在加托特·苏布罗托的命令下都被杀害了。艾地和鲁克曼后来到了雅加达。不过，据安塔拉通讯社在1950年初的报道，在丹戎不碌港已经举行了欢迎艾地和鲁克曼刚从越南和中国回来的仪式。艾地肯定不能告诉毛主席他那时是在中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

包含那些问题的对话显然冒犯了艾地作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共产党的主

席的自豪感。据艾哈迈德·苏马迪等一些熟悉他的人说，与毛泽东主席的对话促使艾地想表现自己作为一个大党主席的天才能力。

他希望实现突破，领导一个得以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经验的伟大事件，用以前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实行过的办法来取得胜利。因此，他想在中国的国庆，1965年10月1日之前实现此胜利。一些人推测，这就是艾地选择9月30日，而不是10月1日和10月5日之间举事，并拒绝通过夏姆所转达的翁东中校关于推迟的建议的原因。

这种理论正确与否应进行调研，不能盲目接受。可能还有导致选择9月30日的其他因素。历史可以在以后解释。很难相信，艾地只是为了希望证明自己超越毛主席，以致于选择1965年9月30日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苏加诺

总统不愿使用“9·30运动”这个词。他坚持使用“GESTOK”，即“十一行动”，是考虑到该运动是午夜12时过后开始的，运动发生在10月1日是更准确的。而正是从这个1965年10月1日开始，印度尼西亚军方便打着“净化1945年宪法的实施”的口号，采取行动建立了军事统治和压制民主的政权。

翁东中校依照夏姆的命令，仍使用“9月30日运动”这个词，虽然行动是在10月1日凌晨2点开始的。目前还不清楚“9月30日运动”这个名称是夏姆还是艾地创造的。

还有人把9·30运动与艾地妒忌约多联系起来，说是妒忌带来了致命的后果。这个理论可以说明如下。

印尼共产党和朋加诺之间良好关系的发展已然清晰可见。朋加诺和约多的关系也更加亲近。比起艾地和鲁克曼来，朋加诺显